

1993年，我母亲生了场病，我们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忽然间她的肩膀就剧烈地疼痛起来，他急着查看我母亲的病情，问吃药的反应，叮嘱咐我们注意观察，明天再去复诊。然后他走了，水

也没喝一口。后来，他介绍我母亲住进二军大。母亲生的是化脓性肩关节炎，来势凶猛，最终得以痊愈。

从此，他成了我家的恩人。我们知道他是这家门诊部的主任，也是一位离休老干部。他每天除了看病还要管理门诊部的行政事务。人家都叫他孙主任，我叫他“孙医生”。我们一家老小，不管生什么病，都去找他看，他在我们眼里就是个全科医生。这个门诊部每个老军医老护士都那么亲切，个个都像自家的长辈。这样的老军医在大医院里都是要挂专家门诊的，可是他们宁愿守着家门口这排简陋的二层楼房，守着有点陈旧的医疗设备，看普通门诊。我曾经写过文章，称赞他们是大柏树的一道晚霞，上海电视台来拍摄，报道他们如何尽心尽责，发挥着余热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，起，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按照红处方规定，我填写过家庭住址。他急着查看我母亲的病情，问吃药的反应，叮嘱咐我们注意观察，明天再去复诊。然后他走了，水也没喝一口。后来，他介绍我母亲住进二军大。母亲生的是化脓性肩关节炎，来势凶猛，最终得以痊愈。

起，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按照红处方规定，我填写过家庭住址。他急着查看我母亲的病情，问吃药的反应，叮嘱咐我们注意观察，明天再去复诊。然后他走了，水也没喝一口。后来，他介绍我母亲住进二军大。母亲生的是化脓性肩关节炎，来势凶猛，最终得以痊愈。

起，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按照红处方规定，我填写过家庭住址。他急着查看我母亲的病情，问吃药的反应，叮嘱咐我们注意观察，明天再去复诊。然后他走了，水也没喝一口。后来，他介绍我母亲住进二军大。母亲生的是化脓性肩关节炎，来势凶猛，最终得以痊愈。

起，去药房拿药的时候，按照红处方规定，我填写过家庭住址。他急着查看我母亲的病情，问吃药的反应，叮嘱咐我们注意观察，明天再去复诊。然后他走了，水也没喝一口。后来，他介绍我母亲住进二军大。母亲生的是化脓性肩关节炎，来势凶猛，最终得以痊愈。

有人对一些所谓的“文化热点”从不关心。这种不关心不是一种傲慢，而是因为思想和生命品质的不同，是这些造成的忽略。每个人的兴奋点有所不同，而这些不同最能说明人与人的差异。

在时下的数字时代，人人痛感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，比如一个知识分子，会觉得有那么多急切要读的书供其选择。有时听说有些东西很重要，应该去看一看，但从今天推到明天，再推到后天，结果几年时间过去了，也不曾去看过几眼。

真的是时间问题吗？当然会有关系。但更大的关系，还是因为他对那些所谓的“重要”并不真正看重。凭一种直觉和常识，他知道那些众人关注的大热点大热闹可以暂时忽略，这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。

举一个例子，讲一讲人与人之间关注事物的不同。有人热衷于读康德，那种老式德语有多少人能读？即便翻译过来也并不好读。但是有人觉得太重要了，康德对于时下的中国太重要了——读康德并引起心灵的震

老军医们真的老了，他们经历了人生第二次退休，依依不舍离开了自己创办的门诊部。门诊部转给一家私人老板承包，搬走了。鉴于从前的业绩，门诊部进入医保，病人不少。医护人员全换了，可我看病配药，还常往那里跑。虽说医护人员亲切不如从前，却还能看出老军医们留下的痕迹——敬业。孙医生也从未隔断过与这家门诊部的联系。他还是那里的医生，有求必应，义务出诊。

见到白穆，我马上转身向他问好：“白穆同志，您好，您的戏我看得太多了，我喜欢看您演的戏。”

因为太突然了，白穆很不好意思，只是点头微笑。我还说：“其实您拍电影前演话剧那会儿，我就看您的戏了，我是您的老戏迷老影迷啦！”我还说下去：“您一向演严肃电影，可没想到您也拍了《不拘小节的人》这样的喜剧，太好了……”

我这样说了，周围座位的乘客一下子都来了劲，全对着白穆七嘴八舌说起话来：“对呀，他是白穆，没错，我也看过他的好多戏。”他们说出了一部部电影的名字：《南征北战》《难忘的战斗》《苦恼人的笑》……一直到车子的最后一排也有人过来向白穆致意。

白穆转向四面八方微笑着回答他们，他是很感动的。可这时候上海影城的车站到了，我只好站起来对白穆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我要下车了，希望您保重！”我下车时，车上还是那么热热闹闹的。

我们影迷就是这样爱熟悉的演员。天衣无缝。

渊博的知识使他在分析病例时更显优势，曾经有个反复黄疸的病人多方诊治都不见效，后慕名来到仁济，经江绍基诊断发现，Budd-Chiari综合征，这个陌生的诊断令在场的医生惊叹不已。经外科手术，这个诊断得到完全证实。

国际肝病学会主席Rudi Schmid第一次来华讲学。他在会上提问了一个肝淀粉样变的问题，正当在座无人能答而尴尬时，江绍基站起来用英文流利作答，Schmid教授大为赞赏，从此与江绍基成为至交。

关注和不关注

张 炜

颤，与之稍微地沟通和对话一次，对另一些庸常就更加不感兴趣了。

再比如说读普希金的《上尉的女儿》——普希金是以写诗著称的，但有人直到今天再读这部中篇小说，那种感动还是不能平息。大师就是大师，伟大的天才真的是不可以重复。

有人一谈起文学就是托尔斯泰，就是鲁迅和苏东坡等人——能不能再谈一点让人眼前一亮、耳目一新的其他人？谈一点当代的、偏僻的，或者是古代的外国的，都可以。试一试，“恶习”难改。因为他们是那么大的天才人物，要超越这些人这些作品太难了——他们最有魅力，所以他们才最值得关注。他们对读者来说就是永久的热点。

可见关注什么，实在是非常大的事情。生说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去买个菜，走在路上，就有人追着问病，老也回不来，他却很高兴，觉得自己有用！

回家后，那把黄灿灿的钥匙老在眼前晃动，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开门钥匙，它开启良知与向善的大门。心里正想着，电话铃响起，女友来电话，告知一件怪事：

保姆斩破手指，去一家用数字命名的医院急诊，先要付费二千八百元再去治疗。朋友身边只带二千元，急了，去问医生怎么这么贵？保姆不肯了，保姆转身就走，说农村割破手脚泥巴涂涂也能长好！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后来，医生竟然追出来，再三说给她们“减免”，改付600多元。朋友一听钱够了，赶紧付款，然后缝针，配药，输液。朋友百思不解问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下子减免2200元？我又不认识他们！我说，这种事我也不懂，这账是怎么算出来的，只有他们心里明白。

放下电话，黄灿灿钥匙在眼前消失了。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“我一生除了‘文革’中的一封检讨书外，从来没有被退过稿，也从来没有人改动过我的文字。”

每天晚上，全家人吃完饭后，在泰安路上他那个80多平方米房间里，一盏灯常常要亮至凌晨。一家四世同堂，没有书房，江绍基一直坐在他那张最熟悉的餐桌旁，一盏青灯一壶茶，遨游在医学知识的海洋中。

后来，家中几个子女都悉数选择了医学事业，家里常会在晚饭后出现这样的场景：一张书桌一盏台灯，两代医生围坐在一起钻研各自的学问。

在江绍基去世后的第二天，有位厂长专程从外地赶来拜访素不相识的江师母。他动情地说，江教授生前曾多次帮助过这家厂，却从未接受过一分酬劳，他希望能对江教授主编的《中华消化杂志》出点赞助尽点心意。

在江绍基去世后的第二天，有位厂长专程从外地赶来拜访素不相识的江师母。他动情地说，江教授生前曾多次帮助过这家厂，却从未接受过一分酬劳，他希望能对江教授主编的《中华消化杂志》出点赞助尽点心意。

在江绍基去世后的第二天，有位厂长专程从外地赶来拜访素不相识的江师母。他动情地说，江教授生前曾多次帮助过这家厂，却从未接受过一分酬劳，他希望能对江教授主编的《中华消化杂志》出点赞助尽点心意。

所以网上的一些争论，弄到家喻户晓了，有人还是压根不曾留意，这一点都不让人吃惊。

有人去参加公众场合的一些聚会，常常被最基本的一些“热点”给难住，什么众口相争、赫赫有名，他却基本上谈不出什么，因为从来没有注意过，更谈不上研究了。其他人总是不信，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——他怎么可能不去关心这么重要的大事？其实他们就是不明白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要允许不同的存在——在他看来，那些“热点”是非常重要的，有的甚至是相当无趣和无聊的。

信息时代的人实在是太忙了，五六十岁的人，大事小事、公事私事，排来排去时间就没有了。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，怎么可能步步紧跟时尚和热闹？如果真的跟上了，那倒是不正常了，有毛病了。

人的兴趣，比如阅读，是很神秘的。有时候人的判断力也是很神秘的，他仅仅是凭感觉冷落的东西，大多数时候也不会有多么重要。



上海姑娘（油画）方世聪

悄悄打开别人的博客，静静地看，记载着——每一餐吃了什么饭什么菜，喝了什么茶与咖啡和点心；有人报告他见到某某和某某等明星歌星名人政要；有人在里边自怨自艾：时运不济、怀才不遇；有人趁机怨天尤人：都是别人不好，自己没有一点错；有人很当一回

事在气急败坏地教训别人：应当如此，不该那样；有人愉快地歌颂自己：伟大、牺牲、为国为民为理想。

大家都埋头不停地写，不亦乐乎。也想过去跟众人报告一番。可是，再想想，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好写的。日子是自己去过，关别人什么事呢？私人的生活，谁有兴趣关注？

记录下来，是怕自己忘记？对于那些能够忘记的事，一字一字努力记下来做什么？

抑或是要说与他人知？你觉得大事一桩，别人一眼都不想看；你觉得无比重要，别人云淡风轻，无关紧要。

朋友外出观光旅游，回来打开他的照相簿，不断地唤你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真有趣！你会认真投入积极去观赏？

仅只感觉那人超级不识趣。

若拼命强迫人去看他个人的相簿，像按着牛的头喝水。

唯有曾经去旅游过的他，自己才有兴致重复地回味观光时光罢了。

别人不知有多么乏味沉闷。

这样一想，索性把博客销掉了。